

# 海上学人

HAI SHANG XUE REN

惜珍 著

一蓑烟雨任平生

掀开『文学是人学』的新乐章

散落在桂叶草堂的册页

六十年弯道相携转过

丽娃河畔念着普希金

千年之外的平淡

只为听得焦声翠

九叶诗人的世纪尾声

人文  
书房

捧着玫瑰采蔷薇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四音同公 阮忠

自愚园路那幢临街的小楼

真知灼见者皆英

# 海上学人

一蓑烟雨任平生

惜珍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学人：—袁烟雨任平生/惜珍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ISBN 7-80646-796-3

I. 海… II. 惜…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上海市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7908 号

---

责任编辑 蒋逸征  
装帧设计 姜明明婕

书 名 海上学人：—袁烟雨任平生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印刷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8  
印 张 14  $\frac{2}{9}$   
图 文 254 面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5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796-3/J·477  
定 价 29.8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401196

# 目录



<b>在愚园路那幢临街的小楼</b>	<b>1</b>
——施蛰存的多彩人生	
<b>真知灼见育群英</b>	<b>37</b>
——徐中玉素描	
<b>散落在桂叶草堂的册页</b>	<b>55</b>
——杜宣的书剑生涯	
<b>捧着玫瑰采蔷薇</b>	<b>85</b>
——何满子剪影	
<b>千年之外的平淡</b>	<b>107</b>
——王水照的学者风范	
<b>掀开“文学是人学”的新乐章</b>	<b>121</b>
——钱谷融的散淡人生	
<b>九叶诗人的世纪尾声</b>	<b>141</b>
——王辛笛的诗样年华	

丽娃河畔念着普希金 161

——王智量印象

只为听得蕉声翠 179

——顾易生侧影

六十年弯道相携转过 193

——贾植芳的一世情缘

回首叫云飞风起 227

——峻青人生赋

后记 247





# 在愚园路上 那幢临街的小楼

——施蛰存的多彩人生

施蛰存（1905—2003），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编辑家，海派文化的『标志人物』。上世纪30年代，他以新感觉派小说蜚声中国文坛，叱咤风云一时。早年，他曾与戴望舒、刘呐鸥等人创报刊、办风人书店，担任过《现代》杂志主编。晚年的他潜心治学，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

## 学海 人上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开山大师，他被海外文艺界誉为“中国新文学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他又成为治学严谨、独具创意的名教授，在诗学、词学、比较文学、金石碑刻与文物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因此荣获了上海文学艺术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

2003年11月19日，阴雨绵绵。上午8点47分，施先生安详地离去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颗巨星就此陨落。

施先生去世前一年，也就是2002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曾拜访已届97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施先生的家在愚园路靠近江苏路口一幢临街的小洋楼里。沿着狭长的愚园路缓缓前行，只见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已脱尽了它华丽的叶子，只有坚挺的枝条在天际勾画出凛然的风骨。施先生家那幢临街的三层洋楼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尖顶，宽大阳台上罗马廊柱的两个拱形门洞，有着暗绿色木头百叶帘的落地钢



晚年的施蛰存心态依旧年轻，对新生事物兴味津津。（摄于1995年）

窗，透射出浓浓的欧陆风情和骨子里的贵族气，令人不难想见它当年的气派和辉煌。

穿过不大的天井，沿着陡峭而狭窄的木头楼梯走到二楼，里边朝南的一间房间便是施先生的书房兼客厅兼餐厅兼卧室，这就是先生的“北山楼”书斋了。我敲门进去，见施先生正端坐在临窗书桌前的一张褐色的老藤椅上，这是他坐惯的位置。窗户朝南，温暖的阳光照着他。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台灯、笔墨、书籍和一些信件。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放满了书，有些凌乱。施先生看上去很清瘦，见了我，微微欠身，点头，示意我坐下。我上前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可他却大声说：“吆！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快用热水捂捂。”边说，边招呼保姆给我倒热茶……

施先生耳背经年，我只能和他笔谈，确切地说，是我用笔提问，施先生口述。谈话中，我发现他的烟瘾不小，几乎不断地在抽烟，不过抽的是雪茄，因为雪茄不像香烟那样容易生痰。他孙女说，施先生是把烟吞到喉咙，尚未进胸，就立即又吐出来，这样，烟的香味已尝，而烟的毒害则大都吐了出来。每天下午，他要喝杯牛奶咖啡，加几块饼干当点心。施先生的眼睛非常好，连老花镜都不用，说的是一口糯软的上海话。他的思维依然敏捷，说到兴头上，会冒出几句他特有的幽默话语。说起令他蜚声文坛的心理分析小说，施先生说：“文学如时装，也有时代的风尚，所谓‘心理分析派’、‘新感觉派’，都是上世纪30年代国际文学上的新风尚，我不过是受到了影响，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创作方法过时了，不流行了，成为历史了，我也不写小说了。”言语中的那种超然、淡然，不由让人生出一种别样的感动来。

这是一个真正悟透了一切的老人。

## 同窗好友：共缔芝兰文字之盟

施蛰存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离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他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因生肖属蛇，取《易经》中“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之意，号北山。父亲是杭州的一名晚清秀才，原先在家乡教书，因其文字、书法出众，被苏州一所师范学堂聘为文员，兼管藏书。六岁的施蛰存便跟随父亲移家苏州，住在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给他举



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施蛰存就被父亲送入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行过拜师大礼后，老师安排他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前坐下，教他读《千字文》。一本《千字文》不到半年他就读完并背熟了。一次，施蛰存跟随父亲游览寒山寺，父亲教他念墙壁上镌刻着的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这便成了他读唐诗的开始。辛亥革命后，父亲失去了工作，全家来到松江，正好原来推荐他父亲进师范学堂工作的陆先生在松江创建了一家袜厂，就请施蛰存的父亲去那里工作。从此，他父亲开始执业工商，全家从苏州迁居松江，未带家具，只带了12只装满书籍的书箱。施蛰存从小跟着父亲读书，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没几年，就把父亲的12箱藏书全读完了。不过父亲的书箱里没有小说，施蛰存就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积聚起来，星期日到旧书摊上去买小说书看。他买的第一本书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后来又陆续买了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外国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施蛰存14岁进中学读书。当时中学为四年制，中学三四年级，即相当于高中。施蛰存升入中学三年级时，学校的数理化及西洋史的教科书，全是英文。英文课则是每学期专读一书。三年级上半学期读的是《沙氏乐府本事》，下半学期读霍桑的《丹谷闲话》。四年

级上半学期读欧文的《拊掌录》，下半学期读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为他以后的文学翻译工作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



课余，施蛰存读了许多文学报刊，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小说、随笔、新诗等。中学三年级时，他开始向上海的一些“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投稿，最初是屡投屡退，他便屡退屡投。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鸳鸯

青年时代的施蛰存，在文坛甚为活跃。

蝴蝶派”最重要的杂志《礼拜六》上。后来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与《半月》、包笑天编的《星期》都发表了他好几篇作品。施先生说,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他也不知道发表文章可以得到稿费,只要能够发表,就已经很高兴了。

这段时期是施蛰存人生的一个关键期。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使他有机会阅读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又使他获得了新思想,进而开始写作小说、新诗,并决心投身文学,当作家。

中学毕业后,施蛰存想考北京大学,因父母亲觉得离家太远,后来就进了杭州之江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师资中

没有学者,惟一让他感兴趣的只有英语。那时,年轻的施蛰存常常独自带了书本在江边沙滩上找一块大石头坐下来看,在滔滔江水的陪伴下,他读泰戈尔的《园丁集》,读拜伦的十四行诗。在杭州施蛰存结识了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叶秋原等人,当时,他们都还在读中学,施蛰存后来曾有一首诗描述他们见面与交往的情景:“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叶张墨阵堪换鹅,同缔芝兰文字盟。”这几个人,都是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因意气相投,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兰社”的文艺团体,并出版了以发表旧体诗词及小说为主的四开旬刊《兰友》,由戴望舒担任主编。

施蛰存在之江大学读了一年,就肄业回到松江。当年暑假后,他和戴望舒一同进入位于上海闸北青岛路青云里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学系的课。丁玲和他们是同级同学,因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的男女同学极少往来。上课时,女同学坐在前排,男同学坐在后排。施蛰存正好坐在丁玲后面,不过,整个学期,只见到这位才女的背影。



施蛰存在大学期间。

施蛰存和戴望舒在学校附近的里弄里租了一间厢房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欧洲文学史。施蛰存和戴望舒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宝通路的茅盾先生家，开头在楼下客堂间里坐，熟了后就到楼上茅盾的书房里去，在几个书架上翻翻书，看有什么外国书就借两本回去。

不久，上海大学迁入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施蛰存和戴望舒就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了一间后厢房，恰巧前厢房就是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周报》的社址，房主是左舜生，于是就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每星期日，《醒狮》同人必然聚集在前厢房畅谈，田汉也在其中。施蛰存和戴望舒就隔着板壁侧耳听之，常闻妙论。施先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卜居欲依孟母宅，岂知身入狮子林。曾左功名出新样，隔墙有耳不能禁。”当时，田汉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职文学教授，刚从日本回国，比施蛰存他们大不了多少。他在中华书局当编辑，每星期来上海大学上一次课，讲授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田汉是湖南人，自称为“南国诗人”，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施蛰存和戴望舒打听到田汉也住在民厚北里，当晚就去登门拜访。见他俩上楼，田汉一边热情地招呼，一边赶紧去床边放下帐门，原来田师母身体不舒服，已上床睡了，施蛰存和戴望舒后悔自己来得太鲁莽，可是，田汉却满不在乎地坐下和他们聊天。

在民厚北里住了不到半年，施蛰存和戴望舒迁居到民厚南里。当时，编印《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以及印刷所都设在民厚南里，创造社的同仁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也都居住在这栋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里，离施蛰存的居所很近。戴望舒曾在他们的信箱里投过一首诗，可是没有回音。后来施蛰存写了一篇小说，题名《残花》，也投入信箱。两周后，《创造周报》刊出郭沫若一小札，称《残花》已阅，嘱作者去面谈。几天后施蛰存去时，不料郭沫若已去日本。第二天晚上，成仿吾来到施蛰存寓所，座谈中，告诉他说，郭沫若以为《残花》修改后可在《创造周报》上发表，等他从日本回来，再邀请施蛰存商榷。可惜，《创造周报》很快就停刊了，《残花》也始终未能发表。施蛰存晚年曾就

此事作诗一首：“残花啼露不留春，文选楼中少一人。海上成连来慰问，瑶琴一曲乐嘉宾。”诗中的嘉宾自然是指成仿吾，他见他们寓所墙壁上挂着一张古琴，便问谁能操琴？同住的叶秋原便取下墙上的古琴，当场奏了一曲。

1923年，施蛰存自费刊印了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署名施青萍，交松江印刷所排印了100册。共收十多篇小说，都是他在之江大学肄业时写的，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故题作《江干集》。《江干集》里的作品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

1924年，施蛰存改入大同大学，戴望舒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一年后，施蛰存也与杜衡一起进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施先生说，当初学习法文是想到法国去留学，戴望舒为了等施蛰存、杜衡一起去法国，就暂时转读震旦大学法科。在法文班读书时，教施蛰存和戴望舒法文的是一位牧师，他用的教材是维克多·雨果和法朗士的“道德昂扬”的作品，但他俩却在私下里贪看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的“不道德”又颓废的作品，并由此爱上了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

震旦大学在法租界，附近比较冷落，施蛰存和戴望舒、杜衡一起租下了天文台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厢房很大，三人每人买了一张床、一个书桌、两把椅子，还合资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开始一起生活、学习和写作。不久，又一起创办了一个32开16页的旬刊《瓔珞》，他们三个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上面，也发表其他人的作品。《瓔珞》一共印了四期，这是施蛰存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三个好朋友由于思想激进，在上海大学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CY”，即共青团。他们常常出席团的会议，散发传单，传递信息。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三人也被列入黑名单，登在当年的《申报》上。在白色

《江干集》，上海维娜丝学会，  
1923年8月初版。



恐怖的威胁下，施蛰存回到松江乡下家中，隐居小楼，闭门不出；戴望舒和杜衡则潜归杭州老家，不久又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反共，风声鹤唳，隐匿到施蛰存松江的家中。

## 创建“文学工场”，开办同人书店

三个好朋友蛰居在施家的一间小厢楼里，他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三个月后，戴望舒难耐寂寞，只身前往北京。在北京，他通过以前同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同学丁玲认识了沈从文、冯雪峰、胡也频等人。两个月后，望舒又回到了松江。1928年初，冯雪峰也来到松江，加入了他们的“文学工场”，小厢房里增加了一张床，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朝夕相处。不过，施蛰存当时已在松江联合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每天上午都要抽出半天时间去教书。那年的四五月，是

他们的“文学工场”最为兴旺的时期，戴望舒的《雨巷》便是那时创作出来的。

一次，施蛰存在《东方杂志》上读到夏丏尊翻译的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这是一篇东方气息很浓的小说，施蛰存便模仿它的风格，写出了小说《娟子姑娘》，寄给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段时间，他们大约每两个星期轮流去市区一次，任务是买书，顺便给他们的著译稿找出版方。这时，上海新开了许多经营新文学书刊的小书店，很多出版商需要文稿。经朋友介绍，施蛰存把



《娟子姑娘》，上海亚细亚书局，1929年初版。

小说《娟子姑娘》再加上两三篇没有发表的小说，编成一本五万字的小小说集，书名就叫《娟子姑娘》，交给一家书店，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上市了。这是施蛰存的第一本由出版商印行的小说集。

与此同时，光华书局同意为他们出版一个小型的同人刊物，刊名就叫《文学工场》，四五万字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可是光华书局老板看了清样，觉得内容激进，不敢出版，便将已打好的纸版送给他们。这份纸版，施蛰存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后来和他的书籍文物一起毁于炮火之中。

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叫刘呐鸥，他是一个生长于日本的台湾人。1928年夏初，他在上海市虹口区江湾路六三花园旁一个日本人聚居的里弄公园坊内，租了一幢小洋房，邀戴望舒去住，希望共同搞一些文学活动。于是望舒就离开松江，住到刘家。这时，冯雪峰也来到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杜衡回了杭州。暑假后，施蛰存住进刘呐鸥家，松江的“文学工场”就这样结束了。

刘呐鸥所租的洋房共三层，楼下是客厅，二楼刘呐鸥住，施蛰存和戴望舒所住的三楼是个宽敞的阁楼。每天上午，三个人都呆在屋里，聊天、看书，各自写文章或译书。午饭后，睡上一觉。下午三点去虹口游泳池游泳，游完泳再到四川北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然后回家晚餐。晚上，一般总是先到四川北路一带看七点那场的电影，施蛰存喜欢的电影明星是卓别林、嘉宝还有邓波儿。看完电影，三人再进舞场跳跳舞，玩到夜深才回家，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施先生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浪漫的时期了。

刘呐鸥喜欢十月革命以后兴起的苏联文学和新流派的资产阶级文学以及德国、美国和苏联的电影，每天都会滔滔不绝地谈上一阵。一天，他说：“我们自己办个刊物吧，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只好自己发表。”三人商量后，决定办一个像《莽原》一样的小刊物，并给刊物定了个名称叫《无轨电车》。

过了几天，刘呐鸥又说：“我们索性开一个书店吧，自己来印一些喜爱的书。”于是，由刘呐鸥出资，就在四川北路、东宝兴路口开出了一家“第一线书店”，横写的黑底白字的招牌也是刘呐鸥亲手写的。书店只有一间店堂，开张时卖的只有《无轨电车》创刊号。几天后，他们向福州路上的各家新文学书店批购了几百本书来充实门面。店堂中三壁皆是

书架，正中设一大书桌，陈列自己所出的刊物《无轨电车》。三人中，刘呐鸥是老板，戴望舒是经理，施蛰存则是营业员。

第一线书店开张后一两天，就有警察来查问，一个多月后，警察局送来一纸公文，内容大致是“查该第一线书店有宣传赤化嫌疑，着即停止营业”。挂了才两个月的招牌，不得不摘下，卖给油漆匠去做别家店铺的招牌了。

过了一段时间，三个年轻人又开始筹备开第二家书店，定名为“水沫书店”，取水面上的浮沫毫不足惜之意，全然没有了“第一线”的豪气。吸取上次的教训，这回决定不设门市部，而是采取出版社的形式，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公益坊内租了一幢单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这里是租界，不用登记报批。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营业室，门口只挂很小的一块招牌，一点也不会引人注目。开张大吉，一本本书印出来，卖出去。出版事业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一家同人出版社，水沫书店一切编辑、校对、

发行等全由刘呐鸥、戴望舒与施蛰存三人分头担任；所出的书都用道林纸印，封面请钱君匋设计，十分精致。

因为刘呐鸥的夫人已来上海，施蛰存和戴望舒就搬到书店楼上的一间亭子间里。施蛰存当时还在松江中学任语文教师，不能常驻上



《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8月初版。

海,只能星期六下午到上海,再赶星期一的早车回松江。暑假以后,他干脆辞去松江中学的教职,并把自己新婚的妻子也带到上海,在鲁迅、茅盾居住的景云里旁边的东横浜路大兴坊租了间房子住了下来。

水沫书店最早印出的是两本小书:冯雪峰译的苏联诗集《流冰》和施蛰存的中篇小说《追》。这是施蛰存仿效苏联小说用粗线条的创作方法写的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故事。这本小书后来被国民党中宣部列入禁书目录。接着,又出版了柔石的《三姐妹》,这是鲁迅托冯雪峰介绍来的,还有胡也频的《往何处去》等。

“水沫丛书”是他们的重点出版物,前后共出版了五种。有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徐霞村的小说《古国的人们》、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里面收入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姚蓬子的诗集《银铃》和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这一套印制精美的丛书出版后,很快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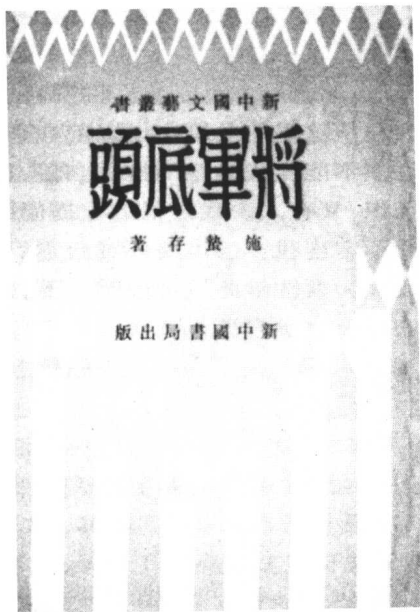
当时,虬江路、四川北路口的新雅茶室是文人艺术家每天下班后的常聚之所,施蛰存他们也经常去喝茶聊天,他在那里结识了曹聚仁、叶灵凤、姚苏凤、张光宇、潘伯鹰等许多文艺圈中的名流。

水沫书店最旺销的出版物是林语堂侄子林疑今译的小说《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这本译著,在短短五个月内再版了四次,销售了12,000册,在当时,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部描写这场战争的小说,1921年在德国出版,三个月内,销售了60万册。法译本在11天内售出七万余册,英译本四个月卖掉九万多册,简直风靡了全世界。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林疑今在暑假期间把它译成了中文,交给了施蛰存,希望水沫书店能够印行。当时,施蛰存他们已经知道马彦祥和洪深也在译这本书,而且原稿已交与现代书局付印刷厂排版。因为要等洪深的一篇两万字的“论战争文学”的后记,所以拖了时间。施蛰存知道洪深事务繁忙,应酬又多,短时间内不可能把文章写成,便把林疑今的译稿接受了下来,并当即和戴望舒带了五听白锡包纸烟,到与他们有老交情的华文印刷所,找到经理和排字房工头,请他们帮忙,在一个月内在把这部20多万字的译稿排出,并许诺排字工在原工价上再增加20%,另外奉送五听纸烟,让他们自己分配。不到十天,印刷厂就送来了初校样,书很快便出版了。他们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等



到洪深、马彦祥的《西线无战事》出版，施蛰存他们的译本已经再版了。由这本书带销的书足有三五千册。

随着业务的扩大，水沫书店需要每个月出宣传刊物，于是，施蛰存他们又办起了《新文艺》月刊。这个月刊25开，每期156页。1929年9月出版了创刊号。创刊号的首篇就是施蛰存的小说《鸠摩罗什》，这是一篇对高僧鸠摩罗什所受诱惑的惊人想象之作，它是施蛰存的一系列非传统的历史幻想曲的第一部。同时，《小说月报》还发表了他的《将军底头》。这两篇都是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用过这样的创作方法，发表后立即轰动一时，好评如云。这些作品为施蛰存建立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声誉，并使他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这以后，施蛰存又发表了《凤阳女》、《阿秀》、《花》等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开创了另一种小说的实验模式。



《新文艺》一共出版了八期，第一卷一至六期是倾向性不明显的同人刊物，从第二卷第一期起，开始以左翼刊物的姿态出现。到第二卷第二期，由于受到了政治压力，为了保全书店，不得不自行停办刊物，并在这一期《新文艺》的封面上印出了“废刊号”三个字。此时，传来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消息，施蛰存他们立即查找资料，在这最后一期中编入了悼念马雅可夫斯基的特辑。

水沫书店经营三年，共出版了40余种书。到

《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月初版。